

本刊征订办  
法见318页

近代史研究

6  
1989

JINDAISHIYANJIU

---

##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

张 海 鹏

---

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是一门新兴的重要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被突出地提了出来，瞧不起近代史研究、“书不读三代以下”的学术界旧习气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这是因为，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共和国的建立，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对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封锁，人民群众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勃发的主人翁精神，以及在旧废墟基础上建设新国家所碰到的旧社会遗迹的反抗，等等，要求人民的历史学家认真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如何取得的？这就要追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如何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的历史，研究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以及历代统治阶级的对策，研究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其中的表现，尤其要总结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大转折，提出了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

标志这一重要改变的事实是：第一，1950年，从解放区进入北京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建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出任所长。一批具有一定素养的历史学者、年青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以及在旧中国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汇集到近代史研究所。第二，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

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一批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从中培养出来；以上两项加在一起，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力量。第三，一批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撰写的近代史著作和严谨的考据书籍出版发行，奠定了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地位。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五十年代初修订重版，大量发行，在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方面起了奠基作用。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1954年修订版）在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建立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方面也起了作用。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事考》等几本史料考辨集的出版，为把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专门分支——太平天国史研究放到可靠的史实基础上做出了贡献。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1966年前的十七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首先表现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了正确的方向。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热烈研读、努力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尝试、探索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近代史的撰述，在批判旧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史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体系、见解方面取得了共同认识，接受了基本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看待、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同时也注意吸收旧中国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积极成果。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再重版并受到欢迎说明了这一点。

五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近代史学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积极行动。195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一书，结集了参加这次讨论的胡绳、金冲及、范文澜、戴逸、柴孟源等人的论文。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是个具体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们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近代史研究，如何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旧史学观点，如何确立中国近

代史的总体系，如何评价近代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等。胡绳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参加讨论的同志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提出了关于历史分期的不同主张，但对于胡绳的意见，与议者多数表示了赞同，并无根本的分歧。这次讨论后，有一批中国近代史的著作问世。代表性的著作有郭沫若主编、刘大年负责编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版）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4年版）。此前还有戴逸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和林增平编著《中国近代史》的出版。前两书虽只有十几万字，但提纲挈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起到了指导和参考作用。

关于近代史分期，参加这次讨论的多数学者都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划在1840—1919年，即开始于鸦片战争，终止于五四运动。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应当把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通常所说旧民主主义革命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看作中国的近代史时期，近代史的下限应当定在1949年9月。荣孟源、李新等当时都持这种观点。据荣孟源后来回忆，五十年代初参加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办公会议的同志都同意这一观点。刘大年1959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以及1964年在向外国历史学者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科学时，也持这种观点。但在实际上，这十七年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19年前的八十年间，对1919年后三十年的历史研究，则薄弱得多。这方面的代表作只有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议》和李新等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

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工作者把正确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

地位和作用问题，当作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之一。这是新旧中国历史学者在史观上的最大分歧之一。以太平天国一百周年和一百一十周年、戊戌变法运动六十周年、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为契机，学者们对太平天国、维新运动、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历史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表现在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运动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进步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从而在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老革命家吴玉章著《辛亥革命》一书，在史学界有重大影响。

近代经济史、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受到重视。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也取得了成绩，丁名楠等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是这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历史人物的评价引人注目，关于李秀成功过评价引发了一场热烈的百家争鸣。这本是学术界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由于“左”的思潮的发展，一场正常的学术争鸣被导入政治性批判的歧路。这是那时政治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学术界的反映。

“文化革命”，十年动乱，窒息了中国近代史的科学研究。近代史研究所被当作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首当其冲。范文澜虽额外受到保护，科学研究却无法进行，终于抱憾辞世。十年间，全国几乎没有出版一部严肃的近代史著作。批判资产阶级、过度拔高农民起义领袖等做法以及“儒法斗争”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等谬论流行。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的现实政治斗争扭曲了学术研究，导致了混乱。这是由于政治上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四人帮”的严重破坏造成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以后，社会科学工作者迎来了建国以来从事研究工作的黄金时期。近代史研究领域也空前活跃起来。这表现在研究机构的扩大，学会一类学术团体迅速发展，学术讨论会频频召

开，国际学术交流兴起等方面，尤其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课题的深入，重要学术问题百家争鸣的繁荣和论著的大量出版上。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得到了充实，研究机构得到调整，分别成立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现代史各研究室，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各个主要方面。研究条件也相应得到了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文、史、哲、经方面的研究所，都有涉及中国近代史或其分支学科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各省、市社会科学院相继设置了历史研究所，个别省还有近代史研究所的设立，绝大多数省、市属历史研究所内都有近代史研究室及与近代史有关的专题或分支学科的研究室。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原有的近代史教研室也充实了力量，有些学校还设立了近代史有关专题或分支学科的研究所或室。一些工科大学也设置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为了培养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后继人材，各研究机构和大学招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与日俱增。发表科研成果的园地也增多了。为适应近代史研究的蓬勃发展，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作为研究者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专门园地。

与近代史研究机构增强力量的同时，涉及中国近代史有关学科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从1978年起，各地成立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研究会、学会如：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华北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孙中山研究会、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江苏省中华民国史研究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等。这些学术性团体，对促进各地近代史学者间学术交流、提高学术研究水平起到了良好作用。

新时期史学的特点之一是各种学术讨论会频频召开。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起，包括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华民国

史、抗日战争史、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等，分支学科如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哲学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人物如林则徐、左宗棠、蔡锷、孙中山等，还有近代会党、教案、光复会、中国国民党等，都曾召开过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后一般都有论文集出版。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开放政策相适应，近代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开始兴起。越来越多的重要学术讨论会邀请外国学者参加。著名的有：1979年南京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1980年济南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1981年武汉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1984年天津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广州孙中山学术讨论会，1985年涿县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杭州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北京中美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广州一中山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苏州柳亚子诞生一百周年暨南社成立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杭州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广州廖仲凯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南京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深圳清代区域经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广州陈寅恪学术思想国际讨论会及戊戌变法康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不仅如此，中国学者还积极参加了在国外或境外召开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讨论会。1982年4月，中国近代史学者胡绳、章开沅、李宗一等应邀出席了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特别学术讨论会，与台湾学者秦孝仪、张玉法等一批讨论了辛亥革命史。1984年9月，近代史学者余绳武、戴逸赴联邦德国参加第29届欧洲汉学家会议，交流了学术问题。1987年7月，刘大年、吴于廑、齐世荣、张振鹄等8名学者参加了在日本京都、东京召开的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1988年12月，张寄谦、陈诗启、夏良才等参加了香港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海关史国际讨论会；等等。此外，在美国、苏联、日本、英国、法国、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的一些学术会议、大学讲坛或图书馆、档案馆里，都可看到中国的

近代史学者。中国学者开始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外国学者也在国内刊物发表文章。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发行十余辑，专门介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欢迎。

新时期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对已往研究的深刻反思。这一反思当然是以全党、全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反思为根据和前提。研究者们认为已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和形式主义的毛病，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是一部中国近代政治史甚至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经济史的研究很薄弱，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重视得不够，思想史的研究刚刚开头，文化史（不论为广义、为狭义）的研究还没有提上日程，军事史的研究停步不前。就是政治史，也只是着重研究了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和运动，对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研究则很不够，因此一部近代政治史也存在跛脚状态。1919年后三十年那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近代史研究者来说，几乎还是一片荒原。从近代史研究的总体布局来说，不少研究者对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固有模式感到不能满足，要求突破并探索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史全局新模式，同时认为，以往从事近代通史或者近代史教科书编写的力量较多，各项专史的研究力量则感不足。近代史研究中一些带指导性的结论和概念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等等，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接受的，但是缺乏严格的、科学的、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论证，因此难以经受住来自反面的挑战。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多限于描述历史事件及其过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显得就事论事，从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剖析两方面来说，都缺乏研究、比较、论证，因而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抵牾的历史现象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从似乎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中寻绎出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落不到实处，可能变成一句空话。这种状况，可能会给资产阶级的研究者提供靶子，

也可能被“四人帮”那样的政治骗子用“儒法斗争”之类的谬说牵着鼻子走，还可能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倡导者所利用。

这种反思在研究者间当然远未形成一致的认识。由于认识并不一致，人们对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对近代史研究从何处深入，认识也不一致。刘大年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的问题，认为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意思是要加强唯物论理论指导，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向前推进。又有人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加强文化史研究才是突破口。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反思引起了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路的开放，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与此前二十多年相较，是大大前进了。从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质量胜于以往，数量大大超过以往二十多年的总和。建国以后至1978年，出版的各种近代史著作不过二百多种，论文约5000篇。十年间出版的各种近代史著作超过1000种，平均每年超过百种；论文约12000篇，平均每年超千篇。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方针带来了国家政治的安定，也给学术研究创造了繁荣的条件。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这十年的确是建国以来的黄金时期。

中国近代通史这几年又有巨制新篇问世。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卷，条分缕析，议论恢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刘大年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已出版了三册，后两册仍在编写中。该书结构缜密，说理性较强，论证较有力，从宏观上把握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吸取同时期近代史研究的积极成果，引起学术界瞩目。此外还有苑书义、胡思庸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和北方4院校编撰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版）的陆续出版。以上几本书都是按五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中形成的基本认识编著

的，都不包括1919年以后的历史。人们对这种体系存在议论和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探索和建立新的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还要依靠专题研究的深入和各个分支学科（包括交叉学科）的发展。应当说，以上几本通史著作反映了建国以来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和水平。

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是已往研究的重点，新时期仍然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成果卓著，确然可观。太平天国史大家罗尔纲以耄耋高龄，勤奋治史，笔耕不断，陆续出版他的考订著作。新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作者说“从青春注到白首”，前后花了近50年时间，功力可谓深厚。他的新著《太平天国史》一百数十万字，也已完成付梓。此外，太平天国研究方面还有几部专著问世：茅家琦等《太平天国兴亡史》、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以及牟安世《太平天国》（修订再版），都是有份量的专著，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的《太平天国运动史》，接受郭沫若的指导，在史书体裁上作了可贵探索。以上这些著作，虽都是近几年出版的，实际上是作者们几十年辛勤耕耘的结果。它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态度，以对史料的考订、辨伪为基础，具体而切实地分析历史材料，对待农民起义及其领袖既注意不要拔高，也不要贬低，平实而有新意，起到了推进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作用。它表明，太平天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颇为成熟的领域。戊戌变法史研究也有前进。汤志钧在这项研究中颇富劳迹。他的专著《戊戌变法史》，是积数十年研究心得而成的，代表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还有一些后起之秀潜心钻研，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孔祥吉不久前出版了《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在发掘新史料的基础上，着力史料辨伪与考证，透过康有为上书，研究戊戌变法运动，积有心得，是一部值得注意的新作。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近几年也较活跃，关于义

和团源流的研究较前有了进展。廖一中等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的出版，作为一本有份量的专著，填补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著不足的缺陷。路遥为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编的《义和团运动》一书，概述了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的主要成就和问题，编选了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的主要论文，反映了义和团研究的目前水平。李文海等还出版了《义和团运动史要录》。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近些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就其研究规模、人才集结、出版论著各方面看，直可与太平天国史相媲美。在学术讨论会的组织和召集、青年研究人员的造就和表现以及研究的后劲等方面，太平天国史研究或者尚且不及。已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金冲及、胡绳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两卷，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两册（辛亥革命前后）。这三部书总结了建国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有益成果，探索和勾划了辛亥革命史的方方面面，各有建树，标志着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阶段。隗瀛涛的《保路运动史》和贺觉非、冯天瑜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则涉及到辛亥革命中的两个重要专题的研究。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清末立宪派和立宪运动的研究，这个时期取得了不小进展。关于立宪派从事的政治活动及其经济活动中体现出的政治倾向，关于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的研究，关于立宪派与清政府、革命派的关系，关于立宪派的历史作用，都有不少论文发表。对立宪派的积极性的总体估价，较前有了突破，可能是这项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进展。当然在立宪派研究的许多重大关结点上，人们还未达成共识。不同观点的争鸣还显得不够全面、充分。现在看来，争论各方到了总结各自研究心得、发表研究成果的时候了。此外，辛亥革命史研究中还有二十多本论文集出版，属于个人论文结集的有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以及胡绳武、金冲及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1981年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辛亥革

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表明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青年史学工作者进入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成为这条战线上极有希望的研究力量。在这些领域以外，关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无论在深度或是广度上，近几年都有了前进。甲午战争方面，出版了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北洋舰队》等论著。

通过研究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可以看到农民阶级在近代史上表现了主力军的作用；通过研究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在近代史上表现了新生产力代表者的积极作用。这在我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上，是人们注目的重点。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缺点是，对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研究得不够，因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近代历史，就不是它的全貌。近些年对清末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表现，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展开了研究，并且取得了初步成绩。这是学者们对近代史研究进行总体反思的自然结果。但是投入的力量还不算多，取得的成绩还不够大，研究工作显得比较零乱，似乎没有确立起引人注目的中心论题，表明这方面的研究的确刚刚起步，所厚望尚待今后。

社会历史本来是多姿多采、有血有肉的。以往的研究似乎抓住了骨头即本质关系，给人的印象是不够丰满，缺少血肉。近些年学者们在弥补这种不足方面作出了努力，开拓出了近代社会史的新领域。除了反映社会本质的阶级关系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研究外，加强近代社会史研究是很必要的。社会史中的有些方面可能与社会阶级关系有较密切关系，有的可能不那么密切（如社会习俗）。研究这些社会现象，对丰富人们的近代史知识，对加深人们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不无助益。南京大学历史系、山西大学历史系都聚集了近代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人才，成立了社会史研究室。关于近代人口研究，关于近代社会底层（如会党、土匪等）研究，关于近代社会习俗研究，关于近代农村社会

结构研究等等，都有学者致力。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同一作者的《中国秘密社会》一书，也已交付出版。乔志强还在主持《中国近代社会史纲要》一书的写作。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似乎也可归入这类著作中，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新的社会现象，

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在新时期突出表现在中华民国史这一新的领域的开辟。一般认为中华民国史起于1911年，止于1949年。在中华民国名义下活动过三个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除辛亥革命史（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研究较有基础外，其余部分的研究都较薄弱。五十年代的科学规划中，中华民国史研究虽定为项目，却从未组织实施。自七十年代初近代史所在李新领导下开始着手此项工作，到1978年建立民国史研究室，南京等地也建立起相应的研究机构，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才引人瞩目。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近代史所民国史室已经发展成为该所最大的研究室，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研究人员：除孙思白已经离休、李宗一不幸去世外，耿云志、杨天石、王学庄、曾业英、朱宗震、周天度等人才济济，正负担着重要研究任务。各地不少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研究人员拥向这块有待开辟的园地。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的中华民国史，应是中国历史中一部断代史，它所涵括的内容应是全面的；单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它至少应包括中华民国历届政府的统治和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部分。目前的研究中，人们习惯于把后一部分划为现代革命史或中共党史，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辟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研究刊物（如《中共党史研究》），拥有众多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但重点尚在它的前期，已经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是它的创立时期，该书第二编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已经出版了两卷3册，讲到直皖战争。此后的部分，正在撰述中。与已有著作比较，此书结构宏富，叙述深入细致，

资料发掘较深，是一部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中华民国通史。袁世凯统治时期是目前研究中较有成绩的领域。北洋军阀的社会经济基础问题，一向为学人关注。近几年开始有学者转向此项研究，艰苦地蒐集资料，发表研究成果。皖系、直系和奉系对政权的争夺，目前尚无较好的专著问世。国民党新军阀间的战争，已出版了张同新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武汉国民政府也有人研究，并已出版刘继曾等著的《武汉国民政府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已提上日程，并已出版了龚古今、唐培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册）和何理的《抗日战争史》两书。抗日战争史的专门著作还有：易显石等的《“九一八”事变史》、姜念东等编写的《伪满洲国史》以及南京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等。这时期还出版了何干之的遗著《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专门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此外，民国外交史、民国经济史方面，也有专著问世。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分别勾勒了北洋军阀和中华民国的兴亡史。对北洋军阀和中华民国史作总体的勾画，目前尚感条件不足，上述两书为此作出努力，是有意義的。饶有兴味的现象是：人们有较多认识的南京临时政府及以武昌起义为标志建立起来的全国第一个与清政府相对立的省级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虽然资料已比较集中，却迄无专门的研究成果发布。南京临时政府和湖北军政府不是可有可无的历史现象，有理由期待：晚出的或者正是久经磨炼、精心结构的史学力作。综观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虽在民初一段历史有可观成绩，总起来看，这个领域目前尚处在蒐集资料的阶段，许多专题尚无人涉猎，大量成果的涌现当在对这一重要领域作了辛勤耕耘之后。1988年《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的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和狭间直树《“三大政策”与黄埔军校》二文，很值得重视。

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研究的繁荣，也是这个时期中国近代史开

拓新领域的突出表现之一。革命史与现实生活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四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其在前进中的挫折，引发了人们回顾中国革命史的热情。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到革命史领域中来，是很自然的。粗略观察，这方面的出版物（主要是资料，加上研究著作和论文）较之民国史和近代前80年史，都要多。五四运动是革命史的起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也较为成熟。代表作可举出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一书。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是一部历史长编性系列著作，其第一卷《伟大的开端》早已出版。该书主要记述五四运动、中共建立及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综合性的革命史著作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现代史》、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1919—1949）》，肖超然、沙健孙主编的《中国革命史稿》，还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中国共产党史稿》（4册）。专门性的著作有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马齐彬等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齐武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陈廉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军事科学院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3卷）、廖盖隆的《全国解放战争简史》等。丁守和研究革命史的论文编成了《中国革命史论丛》。这方面的著作甚多，不备列。一般说来，革命史研究著作还处在历史长编性著作阶段。从科学性要求，这个领域的研究还要进一步深化，提高其成熟度。从宏观的角度加强把握，从微观的角度加强综合分析与研究。同时要强调，研究人员的眼光不能仅仅盯住革命史，要把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这几年有可观的成绩，单是专著就有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全慰天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隗赢涛等《重庆开埠史》、夏东

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等几十种。还有大量论文，论及这一时期的各种经济现象。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这几年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近代中外关系，本质上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一直放在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首位。由于面临六十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的特殊背景，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自七十年代以来得到加强，出版了余绳武等集体编著的《沙俄侵华史》3卷（第4卷已交付出版）、郭绳武等主编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等几本专著，重点考察了沙俄分割中国领土、中俄边界的形成等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必要很有意义的。它不仅以科学的态度为建立中俄关系、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了严肃的抗争。但是中俄之间除了边界形成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内容。中俄关系的研究还有必要拓宽领域。除中俄关系外，近代中国还同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家关系密切，可惜除中美、中俄关系有过一定研究外，中英、中日、中法、中德、中苏等关系都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科学研究。英国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密切的国家之一，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是执牛耳者。可惜至今尚无一部系统的中英关系史或英国侵华史出版。王绳祖的《中英关系史论丛》只是一部论文结集。香港收回谈判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近几年来香港史的研究已提上了日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来关系密切。在近代，日本是唯一一个发动两次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国家，其影响中国历史者至鉅，至今却无一部全面系统地日本侵华史出版。据悉，张振鹄、沈予主编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已告蒧事，于此可得一补。中苏关系对近代中国的后期关系极大，至今并无系统研究。近代史所设立了中苏国家关系史课题组，人们期望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克服困难，发扬中俄关系史研究中形成的

严肃学风，为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做出新贡献。至于中法、中德关系史几乎还未组织系统地研究。王守中的《德国侵略山东史》大约是中德关系史方面第一本著作。中国的周边国家除俄国（苏联）外，与中国的关系史，也几乎无人着手。以上情况，是值得近代史研究者反省的。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近几年取得了不少前进。研究对象的时间从已往集中在辛亥革命以前，转移到本世纪30—50年代。1983年在北京成立的以丁名楠为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起到了组织和促进作用。中美关系史丛书分专著、论丛、译丛等数类，1985年以后陆续有出版物问世。已经出版的2集《中美关系史论文集》汇集了这个时期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若干重要收获。资中筠的专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颇受学者重视。在综合性的研究方面，近几年出版了丁名楠等撰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此书距它的第一卷出版长达28年，是学者们呕心沥血之作，出版后立即受到好评。北京大学还出版了刘培华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吉林出版了顾明义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略》等。

中国近代文化史是近些年才提上日程的近代史分支学科。一支文化史的研究力量刚刚集结起来。近代文化史究竟以什么为研究对象，至今尚在争论，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的界定。看来需要组织力量对近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展开一些个案研究，然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出科学的综合概括，以期尽早形成独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龚书铎、李侃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以及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作编辑的《中国文化》集刊，试图在这方面做出探索。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5册），在近代文化史学科的建设方面，做了有意义的工作。指出近代文化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不无困难，但指出如下著作是近代文化史方面的专著当是可以的。它们是：蔡尚思的《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论》、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张召奎的《中国出